

第二章 現代漢語外來詞的分類

我們要真正了解漢語，它的歷史層面是不能不顧到的。不是說共時研究得要建立在歷史的基礎上，而是共時研究也有觀察的角度和視野的問題，有時必須把漢語放在它的歷史背景去看，才明白其究竟。¹漢語中的外來詞，就有着悠久的歷史。爲了對漢語外來詞有個整體的認識，有必要先將漢語外來詞進入漢語的幾個歷史時期和來源加以簡述。因此，本章將分爲兩個部分（漢語外來詞的歷史分類和現代漢語外來詞的共時分類）而論述。

第一節 漢語外來詞的歷史分類

外來詞的吸收和使用是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互相交流、語言互相影響所產生的必然現象。外來詞是雖然屬於詞彙系統的一個成員，但是，它的產生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社會現象，一種文化現象。在外來詞吸收引進的過程中，社會歷史背景、傳統文化觀念、民族心理因素等都會對外來詞產生重大影響，甚至能夠決定外來詞的面貌。從漢語外來詞吸收和引進的歷史來看，漢民族的社會歷史地位、漢民族的傳統文化觀念，漢民族的心理因素等的確發揮過不可低估的作用。²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大的中外交流，都在詞彙層面上留下一層外來詞彙，因此，語言學可以從歷史上豐富的漢語外來詞彙層考察中外文化的交流。我們

¹ 張彩霞著，〈漢語外來詞與漢民族文化心理探索〉，《社科縱橫》，1997年第2期，頁58。

² 王力著，《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6月第1版），頁507。

可以按照漢語外來詞的來源和時代來分類如下：³

壹・來自匈奴和西域的外來詞

漢族和外族發生關係應說是很早的，然而，因為時代過於久遠，已不甚可考，到了秦漢，無論經傳、緯書、史乘、諸子，以至辭賦，就多有關於譯事的記載。然而，周、秦、西漢的翻譯實例，很少保存下來。⁴

³ 雖然外來詞的分類是多種多樣的，但從總體上講，主要有三種。第一，按漢語外來詞的詞源進行分類。高明凱、劉正琰(1958)《現代外來詞研究》的典型的分類和分期是：(一)先秦兩漢時代來源於中亞諸語言的外來詞(二)魏晉南北朝時代來源於梵語的外來詞(三)唐宋元時代來源於突厥語、蒙古語的外來詞(四)戊戌政變(1898)至辛亥革命(1911)時期來源於日語的外來詞(五)「五四」運動(1919)以後來源於英語的外來詞(六)1949年以後來源於俄語的外來詞(七)其他來源於南海諸語言和國內少數民族語言的外來詞。王力(1958)則以鴉片戰爭(1840)作為古代借詞、譯詞與近代新詞的分水嶺。他說：「現代漢語新詞的產生，比任何時期都多得多。佛教詞彙的輸入中國，在歷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詞彙的輸入，那就要差千百倍。」。第二，按外來文化輸入中國的各個時期，對外來詞進行分類。如東漢至隋唐的佛教外來詞，明末清初的西方科學外來詞，等等。潘允中(1989)在《漢語詞彙史概要》分成(一)上古時期的借詞(二)中古時期的借詞(三)近代時期的借詞(四)鴉片戰爭後漢語大批吸收東西方借詞和譯詞(五)直接來自西歐的借詞和譯詞(六)日本譯名的借用和日語借詞(七)“五四”以後出現的新詞。第三，按外來詞輸入的方式分類。在以上三種分類中，第一、二類有時具有一定的聯繫，如來自梵語的漢語外來詞就是東漢至隋唐的佛教外來詞。如果能將詞源搞清楚，這兩種分類基本不成問題。本文依照大多數學者的分期方式及外來詞大規模引進的時期略加變化，分成(一)古代來自匈奴和西域的外來詞(二)來自梵語的外來詞(三)來自蒙古語、滿州語的外來詞(四)鴉片戰爭前自西洋的外來詞(五)“五四”前後的現代外來語五個階段來說明。

⁴ 羅宗濤著，〈古代翻譯述略〉，《漢學研究通訊》，1982年第2期。

比較能夠說得清楚的，則是漢代與漢代以後所吸收的匈奴語和西域語。漢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兩個鼎盛時期之一，其經濟的發達，文化的繁榮，國力的強盛是以後各個朝代無法比擬的。在這種國泰民安的社會背景下，漢代的統治者主動與外族接觸，漢代的通西域是這種接觸的一個高潮。

隨著與外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頻繁交往，漢民族自然向其他民族輸出了大量的漢語詞彙，同時也從外民族語言中吸收了一些的外來詞。因為，不同文化之間的接觸絕不僅僅產生單方面受益的現象，接觸的結果往往是相互受惠，相互滲透的。然而，漢時期進入漢語的外來詞吸收的範圍並不是廣泛全面的，而只涉及較少的領域。漢代所吸收的外來詞大都是表示中國沒有的動物、植物、食品、樂器等的名稱，如“獅子”、“苜蓿”、“胡琴”等等。

以上這個特點說明，國力的強盛與否同外來詞的吸收有密切的關係。如果一個國家是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強國，那麼在語言接觸中它就具有主動性，它可以更多地輸出自己的詞彙而有選擇地有條理地輸入外來詞語。以下具體地加以說明來自匈奴和西域的外來詞。

一· 匈奴外來詞

“匈奴”之名起於戰國，之前有“鬼方”、“混夷”、“獯鬻”、“玁狁”、“戎狄”等不同稱號，又叫做“胡”。⁵匈奴大約在公元前七世紀時已在北方存在，而興盛於公元前三世紀的戰國時期，衰落於公元一世紀的東漢。它在大漠南北活躍了 300 年，其後在四、五世紀時又在中原地區繼續活躍了將近 200 年，最後同化於中原。這個種族歷商周

⁵ 潘允中著，《漢語詞彙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9 月)，頁 122。

秦漢四代，都曾不斷地跟漢族發生過多次的戰爭。這樣長期的巨大的歷史事件，不可能不反映到漢語中來。因此，在漢語中就留下了一些來自匈奴語的外來詞。⁶這些匈奴外來詞絕大多數是音譯的。例如，“駱駝”、“胭脂”、“琵琶”等等。

駱駝——初作“橐駝”。《逸周書·王會解》在篇末列舉了十三個北狄名稱後說：「請令以橐駝……爲獻。」《山海經·北山經》中也有「其獸多橐駝」的話。

胭脂——是一種用胭脂花制成的搽臉顏料，也寫作“焉支”、“煙肢”、“燕脂”、“臙脂”、“撚支”，都是同一個詞的音譯。《史記·匈奴列傳》有“焉支山”、“正義”引《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琵琶——胡樂器名。初作“枇杷”，《譯名·釋樂器》：「枇杷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應劭《風俗通義》卷六作“批把”，說“以手批把，因以爲名”。⁷

在漢族與匈奴等族的來往中，由於漢族在經濟文化上佔據著絕對的優勢，因此，漢語吸收的匈奴外來詞的範圍不大，除了與徵戰有關的軍事制度、君臣名號等等外，這些語言對漢語的貢獻無幾。由上可知，經濟因素在語言的流播及變異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歷史上漢語多次在民族間的語言融合中居於主導地位，就是明証，而這一點，在當今的社會條件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充分。就大陸

⁶ 潘允中著，《漢語詞彙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頁122。

⁷ 史存直著，《漢語詞彙史綱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1月），頁103-104。

與海外漢語社會比較而言，經濟上的差距遠比廣東和內地的差距大，大陸處於相對落後的地位。落後的經濟地位，就決定了只能是大陸更多地引進吸收海外的東西，而不可能相反。所以，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就語言來說，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大陸漢語向海外漢語靠攏。

二·西域外來詞

“西域”的名稱大概始於漢代，籠統指玉門關、陽關以西的廣大地區。始見於《漢書·西域傳》，它包括於闐、大宛、焉耆、阿拉伯等國在內，習慣上也包括從西域這條交通路線前來和中國交往的大秦(羅馬帝國)、安息(古波斯國)、身毒(即今印度)在內。從漢武帝派張騫通西域(西元前 139)，班超父子兩次出使西域以後，漢朝與西方諸國的交往才日益頻繁，西域許多動物、植物、礦物、加工物也相繼進入中原，西域語進入漢語的時間也以這時候為主。

實際上，在這以前，中西方也已經有了很多接觸。例如，《逸周書·王會解》記述周成王時西方諸族前來交換物產的盛況，其中即有西南戎族獻的“曾耳”(即狻猊，詳下文)；《穆天子傳》記述周穆王西游的故事。兩書所記，並不純屬虛構，從中可以約略窺知先秦時代漢族和西南諸戎族的交際情況。因此，西域外來詞的傳入，實際上是在漢武帝以前，範圍應該包括西戎和西南諸族語在內。⁸來自西域的外來詞也幾乎全是音譯的，比如，“獅子”、“苜蓿”、“瑠璃”、“葡萄”、“石榴”、“椰”等。

石榴——是“安石榴”的簡稱。《博物志》說：「張騫使西域，得安

⁸ 潘允中著，《漢語詞彙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頁122。

石國榴以歸，故名安石榴。」“安石”就是“安息”（Arsack），屬古波斯語。

葡萄——又寫作“蒲陶”、“蒲萄”。《史記·大宛列傳》：「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有葡萄酒，多善馬。」《通志略》二十四，「葡萄藤，生傳自西域……張騫使西域，得其種而選，中國始有。」關於“葡萄”這個詞的來源，有不同的看法。勞佛爾認為來自伊蘭語 *buduwa*，它的詞根 *buda* 和新波斯語 *būda*、中古波斯語 *bātak* 有關。

苜蓿——又寫作“目蓿”。俗稱金花菜、草頭、盤歧頭。《史記·大宛列傳》：「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可見苜蓿是張騫通西域時傳入中國的。據德國學者勞佛爾（B.Laufer）考證，這是古伊蘭語 *buksuk* 或 *buxsux* 的音譯。⁹

然而，西域的情況跟匈奴的情況卻有一點不同。在漢族與西域的交往中，西域這片廣袤富饒的土地培育出大量新奇的物產，更蘊育了與漢族差別極大的藝術、宗教等。當漢族與西域接觸時，不能不首先為其詭奇的名物、藝術所吸引，而西域的精深文化以及物質文化對漢族產生的極大的影響。

總結說，這一時期漢語中的外來詞可能不多，這是因為那時漢族的文化水準遠高過近鄰諸族，我們從以上的例子不難看出漢族更多地輸出自己的詞彙而有選擇地有條理地輸入外來詞語。中國在那個時候已有相當發達的文學語言，外來詞的需要也不多。再加上，早期的漢語中的外來詞已不易辨認，而且對早期和漢族在文化上有接觸的別民族的語言也

⁹ 史存直著，《漢語詞彙史綱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1月），頁104。

懂得太少，有些別民族的語言又早就消失了，這些原因使我們不可能將各種語源的外來詞列舉窮盡。然而，我們還是通過現存的外來詞不僅能獲得有關匈奴和西域民族的文化信息，而且通過外來詞本身的研究能獲得有關漢民族的文化發展情況。

貳·來自梵語的外來詞

中古時期（公元四世紀東晉時代～十二世紀南宋前半期）漢語中的外來詞，以佛教梵語佔最主要地位。但是，這不是說佛教外來詞傳入中國是從中古時期才開始的。佛教傳入中國，是從西漢末年開始的。《魏書·釋老志》對此記載：「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¹⁰此後佛教即由印度逐漸播散，並由陸路和海路二支傳入中國。陸路傳入較早，約在公元一世紀兩漢之際。自東漢末年至東晉以前，佛經翻譯已經逐漸多了起來。然而，在這個時期，佛經絕大部分是直譯的，文詞晦澀難懂，大大限制了它的流通範圍。梵文屬印度雅利安語系，語詞大都多音節，詞形非常長，有許多複輔音。漢語屬漢藏語系，文言大都單音節，白話大都雙音節，雖然可以延長到三音節、四音節等，可是模式刻板，沒有複輔音。而且，梵文是表音文字，用“天城體”字母，是一種音節性的輔音字母，拼音靈活。反而，漢字是“字符”文字，不僅外形迥然不同，而且結構有天壤之別。從梵文譯成漢字，沒有語素可以聯想，沒有詞形可以憑依。¹¹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六朝以前，佛經只是供佛教徒內部誦習用的。東晉以後，風氣一變，

¹⁰ 楊家駱主編，《魏書》（台北：鼎文書局，1978年3月初版），頁3025。

¹¹ 周有光著，《周有光語文論集》（第四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頁150。

佛教盛行於南北朝，佛經也改用了意譯，流傳很廣，有的則以進入漢語的基本詞彙，到了隋唐兩代，此風尤盛，唐以前佛經的翻譯主要是意譯、直譯，不大主張在經文中夾音譯字。到了唐代，玄奘首次提出了關於音譯的“五不翻”原則，在佛經翻譯上進行了一次大變革，玄奘這原則開闢了一個譯名規範的時代，並因此而又引進了一大批佛教外來詞。¹²佛教外來詞，大抵可以分為音譯、意譯、半音半意譯三種，其中以意譯佔最多數，例如，“佛”、“塔”、“閻羅”、“現在”、“方便”、“平等”、“彼岸”、“懺悔”、“蘋果”等。¹³

塔——是梵語 *stupa* 的音譯之略。這個詞《大唐西域記》譯為“率堵波”，也有譯為“率都婆”的。還有譯為“兜婆”、“偷婆”、“塔婆”的，則是把 *stupa* 節縮為 *tupa* 了。“塔”即“塔婆”之略，則 *tupa* 又變成 *tap* 了。

佛——是梵語 *buddha* 的翻譯，意思是“覺者”或“智者”。這個詞初譯作“浮屠”，後來也有譯作“浮圖”、“佛圖”、“佛陀”或“佛馱”的，簡稱為“佛”。

方便——梵語 *aupayika* 的意譯。原指佛菩薩為化益衆生而用的權宜手段。《維摩經》：「以無量方便，饒益衆生」。

平等——梵語 *samata* 的意譯，和“差別”相對待，指無差別，普遍。

至於佛經中的梵文外來詞，用現代音讀起來，雖然和梵文相去萬里，可是我們要注意，那大都是六朝隋唐時期借來的，用現在所

¹² 參見史有為著，《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頁168-172。

¹³ 潘允中著，《漢語詞彙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頁139。

知的隋唐音讀起來，比現代音就像得多。例如，梵語 *Buddha*，隋唐時代的音是[b'uSt d'A]，而現代音是[fu t'uo]。¹⁴隋唐借字音是“佛陀”來自梵語的外來詞不但直接增加了漢語詞彙，還為現代漢語吸收外來詞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頗有啓迪之功。首先是簡化音節，音節的多少是外來詞漢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梵文屬印度雅利安語系，詞語大都多音節，詞形非常長，有許多復輔音。漢語屬漢藏語系，文言詞大都單音節，白話詞大都雙音節，沒有復輔音。省略原詞的音節來遷就漢語的語音習慣，早在漢語吸收梵語系統外來詞時就開始了。¹⁵

其次，開音譯加類名、半音半意譯詞先導。音譯加類名、半音半意譯是吸收外來詞的重要途徑。但是，應當指出，此法並非現代漢語吸收外來詞才有。在漢語詞彙發展史上，翻譯佛典所用的「梵漢合璧」造新詞的方法，開創這些詞的先導，具有特殊的影響和意義，是翻譯史上重要的一環。使用最廣的是音譯加類名詞，尤其是簡化後的單音節、雙音節音譯佛詞再加漢語類名，如，“佛土”、“佛曲”、“佛事”、“佛經”、“般若字”等。如此構成的詞很多，往往成系列，其能產性令人吃驚。

再次，創音意兼譯法。音意兼顧的造詞法能比較好地照顧漢語的特性，幫助人們了解新詞的意義。如根據漢字表意的特點，恰當地選用一些形聲字，就能起到既表音，又暗示詞意的作用。一般認為，「這種方法是前期翻譯所無的。」¹⁶然而，實際上，在佛典翻譯時，音意兼譯的造詞法已得到充分利用。如“佛”，其音譯全稱初作“佛

¹⁴ 董同龢著，《語言學大綱》（台北，東華書局，1987年10月初版），頁178。

¹⁵ 例如“魔羅”——“魔”、“劫簸”——“劫”、“禪那”——“禪”、“阿羅漢”——“羅漢”、“菩提薩”——“菩薩”、“迦沙曳”——“袈裟”等。

¹⁶ 潘允中著，《漢語詞彙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50。

屠”，後來卻通行“佛”。除有語音上的關係外，還有一點即是，“佛”字作為對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佛德尊稱，當然比用“浮”字更意思，因而易接受、通行。又如“彼岸”一詞，其中“彼”是梵文 *para* 的音譯省稱，本作“波”，因“彼”、“波”古音相近，後通用“彼”。世俗者對“我”執著不捨，佛家把此視為萬惡之本，主張無我，而生與死可謂“我”所存在的總代表，故佛教把生死之境界叫“此岸”，而將破除我執、熄滅生死輪迴而獲致最高之理想境界稱“彼岸”。用“彼”既能合於梵音，又可與“此”相對，表示這兩種絕然相反的境界，可謂解頤妙詞。這樣的音譯詞自然能完全融於漢語，人們往往不易察覺其為外來的。¹⁷當時翻譯佛典時用的音節簡化，音譯加類名法，半音半意譯法，音意兼譯法都是現代漢語翻譯外來詞時常用的方法，如此，佛教外來詞對現代漢語外來詞的影響無置疑。

除了因宗教傳入的豐富外來詞外，當時尚有許多與其他民族交流而傳入的外來詞。尤其在唐代，由於國力強盛，民族自信心增強，對外來的文化亦採取開放的態度，這個時期，中亞文化與漢文化的交流形成了一個高潮。尤其在舞蹈，音樂方面的外來詞也很多。分析這時期進入漢語的外來詞，可以看出這樣一個特點。這個時期外來詞吸收的範圍不是廣泛全面的，而只涉及較少的領域，絕大多數與佛教有關係。這個特點如上所述，國力的強盛與否同外來詞的吸收有密切的關係。¹⁸

¹⁷ 參見梁曉虹著，《佛教與漢語詞彙》（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頁489-496。

¹⁸ 呂冀平著，《當前我國語言文字的規範化問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259。

參·來自蒙古語、滿州語的外來詞

一·蒙古語外來詞

漢族歷史上有過外族的統治和侵入，如蒙古人統治的元朝時期確實給漢語帶來一些外來詞，但是，有些則隨著元代 160 多年統治的結束而退出了中國社會的舞台，沿用至今的是行省制度以及若干個遊牧文化的外來詞。由於蒙古文化因其相對落後而消退，蒙古語在漢語中遺留下來的並不多，特別是有關日常生活的詞語更是少見。因此，在漢語中留下印記的仍是帶有遊牧文化色彩的與軍事相關的蒙古詞。比如，“胡同”(小巷)、“站”、“答剌罕”(一種授與立功官兵的軍銜)、“阿拉特”(百姓)、“戈壁”(沙漠)等。

站——是從蒙古語借來的，又稱“站赤”。據日本人羽田亨的研究，“站”是蒙古語 *Jam* 的音譯，義為道路；“站赤”是蒙古語 *Jâmâ* 的音譯，義為驛站。後來“站赤”也簡稱為站了。

蒙古汗國及元建國之初，仍保留著自己本民族尚武的風氣。蒙古民族到元世祖忽必烈時代不可避免地與鮮卑、契丹等族一樣走上了與漢族、漢文化融合的道路。雖然忽必烈不像魏孝文一樣極端地推崇漢文化，但是，為了鞏固其統治，他還是利用行之有效的漢制、通曉漢文化的漢儒來幫助自己治理國家，同時，提倡漢族傳統文化並用以培養蒙古子弟。這樣一來，作為蒙古族本族的遊牧文化漸漸在漢地受到消弱，傳統的漢文化又一次借機而起，包圍了蒙古文化。因此，蒙古語源的外來詞除了早期打入漢語的反映軍事制度、君臣名號以外，其他能在漢語中站住腳的只是很少的一些日常生活用語及宗教名稱、百姓的稱號等。考察這些蒙古來源的外來詞，它們大部分與蒙古族特有的物產、樂器、宗教信仰有關。而且時至今日，它們中的大部分已消亡，只有少部分已移植到中

原大地的物品，如“猞猁”、“哈叭狗”等才得以在漢語世界中長久地生根。蒙古族雖統治中原 160 餘年，但是，在強大的漢文化面前，它不得不收了其刀劍之威，在漢語中留下遙遠的充滿遊牧色彩的軍事政治名詞及寥寥幾個日常語詞，而後悄悄地隱身於漢文化的背後。¹⁹

二·滿州語外來詞

明崇禎十七年(1644 年)清兵入關，滅亡明朝，從此開始了有清一代。自此，滿洲文化便進入中原地區。雖然清統治者曾極力維護滿州文化，但是，像元朝一樣，在強大而先進的漢文化面前，滿洲文化雖挾有刀兵聲威終究不敵漢文化之悠久、厚實、嚴密，因而 300 年來漸漸消退，終至融化于漢文化之中。期間滿語能滲入漢語裡的，也多是官號軍名以及與早先部落有關的一套名詞，而日常生活用詞，則現在很少能見到，如“把式”、“薩齊瑪”、“哈士蟆”、“媽虎子”、“喇忽”等，其餘的可能在入關的滿州人中使用一段後便被漢語漸漸取而代之了。²⁰

薩齊瑪——又寫作“薩奇馬”，滿洲語 *Sacima* 的音譯，是一種用麵粉加冰糖、奶油等制成的糕點。

總結說，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滿州人雖然先後統治中國共達數百年之久，但是，由於他們文化較低，人數少，所以他們的語言都未能對漢語發生多大影響。所以現代漢語裡的蒙古語外來詞和滿州語外來詞，真可謂是寥寥無幾。甚至這寥寥無幾的外來詞，除了極個別的還使用以外，其他的都不使用了。

¹⁹ 胡曉清著，《外來語》（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 年），頁 115-116。

²⁰ 史有為著，《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年 4 月），頁 153-155。

肆・鴉片戰爭前來自西洋的外來詞

中國在漢唐兩代就曾和大秦，波斯等西方國家發生過關係。到了元代，蒙古人一時強盛，建立了地跨亞歐兩州的大帝國，遂導致了中國和西洋的直接來往，這是對於推動歐亞交流極有影響的一件事。還有另一件事是明朝的所謂“三保太監下西洋”。從這個時期以後，東西洋的交流遂日益開展，西洋的傳教士和商人陸續到中國來。到了明朝末年，尤其是在十六世紀末期至十七世紀初期，意大利人利瑪竇(Ricci Matteo)等一群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除了傳教外，同時，也和徐光啓等人翻譯了一些科學書籍，把西洋的文化知識介紹給中國。這就是中國文化史上著名的“西學東漸”。固然，西學東漸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在科技文化上，但對漢語也不無影響。例如，王征所譯的《遠西奇器圖說錄》中的“齒輪”、“滑車”、“風扇”、“螺絲”、“機車”、“起重機”、“自行車”、“輪盤”、“地球”、“重心”、“地平線”、“水庫”、“比例”、“載重”等，李之藻、傅濟泛合譯《名理探》中的“關係”、“惟能”、“特殊”、“靈魂”等，徐光啓譯《測量法義》中的“測量”等等。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對明末清初耶會士們的科學翻譯活動，做過公允的評價，他說：「利瑪竇……等，自萬歷末年至天啓、崇禎間，先後入中國，中國學者如徐文定（光啓）……都和他們來往，對於各種學問有精深的研究，對於歷算都有興味，而且喜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徐、李諸人的影響不小」。²¹這樣，中國人初步同西洋文化接觸，漢語中出現許多來自西方語言的外來詞。

伍・“五四”前後的現代外來詞

²¹ 顧之川著，《明代漢語詞匯研究》（保定：河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頁8。

隨著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中國被迫開始與西方接觸，對外接觸的被動狀態導致語言、文化接觸的被動狀態，導致了外來詞吸收的失控狀態。王力曾經說過：「現代漢語新詞的產生，比任何時期都多得多。佛教詞彙輸入中國，在歷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詞彙的輸入，那就要差千百倍。」²²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爲了吸收外國文化以圖富強，翻譯事業就逐漸廣泛地開展起來。1862 年到 1902 年北京設立的同文館，1870 年到 1907 上海江南製造局附設的翻譯館，都是做翻譯工作的。此外，天津的北洋學堂、上海的南洋公學、海軍衛門、總稅務司、以及時務報、廣學會、墨海書館等等都做了一些翻譯工作。其中江南製造局的翻譯館出版的譯著達一百七十多種，包括軍事、工藝、理化、算學、天文、生理、政治、史地、法律、商業、農業等學科。在這些書籍的翻譯中，會產生了大批的外來詞。可是，因爲它們是比較早期的東西，質量也參差不齊，有些譯名不大科學，有的又傳流不廣，因此好多詞並沒有沿用下來。²³另一方面，外來詞大量湧入，使得沒有完善的外來詞體制的漢語無法在短時間內將其轉寫爲意譯詞，這樣，這時期外來詞最初大都是以音譯詞的形式出現的。一直過了許多年，漢語才有機會將這些音譯詞轉爲意譯詞。五四運動前後，隨著社會上譯書辦報高潮的掀起，外來詞更是大量湧入，使用新的外來詞既是當時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時亦是文化人中的一種時尚。而且，由於新的技術、新的產品、新的思想、新的觀念大多來自以歐美爲主的西方國家，加之英語日益成爲國際性語言，所以，漢語外來詞吸收的重點又轉移到英語，特別是美國英語方面。這明顯地表示一個國家的

²² 王力著，《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 年 6 月第一版），頁 516。

²³ 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編著，《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言的變遷和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年 12 月第 1 版），頁 76-77。

語言所受的影響和流行趨勢往往是同該國的科技水平，經濟實力，綜合國力以及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密切相關。在這相對集中性的一面外，同時也有一些外來詞是譯自法語、德語、葡萄牙語、日語等語種的，又體現著當今外來詞來源豐富性的一面。例如，“芭蕾舞”(ballet)借自法語，“伏特加”借自俄語，“納粹”(Nazi)、“榻榻米”(tatami)和“木乃伊”(mumia)分別源於德語、日語和阿拉伯語。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外來詞中還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詞佔了很大比重。日語曾借用了大量漢字，“西學東漸”還表現在許多西方語詞經日本“漸”到中國。明治維新後，日本從西歐吸收了大量語詞，其中有許多是用漢字書寫的，並又流回到漢語，讀音和意思都跟原來的漢字不一樣，故這類外來詞常難以辨認和確認。²⁴

總結地說，漢語如今的面貌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吸收了外族語言眾多的給養。中國文化向來具有廣大的包容性，歷經秦漢及魏晉、隋唐時期外國文化的輸入，甚至遭受元、清等異族文化的統治，都能夠屹立不搖，反而，不斷吸收新血。²⁵²⁶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曾經說過：「中國語不但在應用的範圍上，超過歐洲幾種通行的語言，如英語、德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而且從文化上的勢力看來，也可以和這幾種語言互相媲美，立於同等的地位。歐西語言成為高等文明的傳播工具，是近世幾百年以內的事；至於中國有了四千年的文學，這種文學至西元前數世紀時已完全臻於成

²⁴ 張德鑫著，《中外語言文化漫議》(北京：華語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90-192。

²⁵ 其實這種看法是從西方語言角度提出的，未免失之偏。因為外來文化的進入實際上是通過外來概念的引進而實現的，而外來概念既可以用音譯方式引進，也可以用意譯方式導入。不過音譯具有能快速引入的優點罷了。

²⁶ 參見史有為著，《漢語外來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1月)，頁119-125。

熟，內中包含哲學、歷史的考證，以及純文藝、純美術的作品很多。」²⁷
如此，漢語中從古至今融匯了難以計數的外來詞，這些外來詞五花八門，繁豐多樣，我們無疑置信漢語外來詞繼續增加。²⁸

第二節 現代漢語外來詞的共時分類

早期，中國人把引進的外來事物表示的時候，最常見的方法，就是在這事物上加一個“胡”字，如“豌豆”出自西胡，所以，就稱之為“胡豆”。不過，這種冠以產地以命名外來事物的方法，雖然方便，然而，也有其限制。其一是這些事物，必須是中國已有的，譬如“弓”、“瓜”、“椒”、“牀”、“桃”、“兵”等，中國已有，所以，可加個“胡”或“夷”、“洋”等字，以別於中國的事物。但是，遇到一些在中國並沒有的事物，就無法用這個方法來表示。像“琵琶”、“葡萄”、“玻璃”、“和尚”、“比丘尼”等。於是，只好用別的方法來表示。其二是即使是中國已有的事物，也不盡然可以冠上產地來表示。譬如“酒”類，不僅種類很多，產地也多，如一概用“胡酒”稱之，難免混淆。為了解決這些限制，於是，用其他的方法來表示外來

²⁷ 熊文華，《漢英應用對比概論》（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2。

²⁸ 韓語也不是例外，隨著跟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的增加，外來詞的使用越來越頻繁而增加。

以下是韓語辭典中出現的外來語素的統計。

辭典名	著書	發行年度	外來語素
朝鮮語大辭典		1938	166
		1947	3986
國語大辭典		1961	12700
金星版國語大辭典	3	1993	21500

事物或觀念，就有必要了。²⁹

壹·純音譯

許多外來詞在剛引入時，由於其表達的概念在漢語中尚無對應物，更無對應詞。這種情況下，人們往往採用純音譯法將其翻譯出來。純音譯詞根據外語原詞的發音特徵，選取與其發音相似的漢語的詞或語素將原詞譯過來，不考慮外來詞的意義。這是外來詞引進初期人們所喜好的方法。而且，世界各國拼音文字處理外來詞最常見的。這種純音譯法直接、簡易，而且具有異國情調，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彙。

儘管純音譯很方便，外來詞引進初期很受歡迎，可是，就漢語外來詞的歷史來說，純音譯詞的總數是遠遠不及意譯詞的。這是由於最初遇到外來的新事物、新思想、新動作時，人們還不能十分理解它的真面貌或涵義，爲了趕緊拿來，所以就採用了音譯。但是，採用音譯的外來詞，有時很難上口，有時又會使人望文生義，於是，經過一段時期的實踐，往往廢棄了音譯，另外創造了新的意譯。這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漢字本身的構造所引起的。譬如，20世紀初傳入中國的電話，起先叫“德律風”，是從英語 **telephone** 音譯過來的，這個外來詞曾經流行過一段時間，但後來人們不叫“德律風”，逐漸改用“電話”了，或許“德律風”這個詞很難上口。再如，英語的 **face** 音譯下來，跟“費”同音的有“肺”、“沸”、“狍”、“痈”、“吠”、“廢”等字，其中實在沒有一個是很好的字眼。而要接上密合對音的第二個字，竟沒有其他的同音字，雖然，純音譯詞與詞的意義毫無聯繫，然而，在漢字是表意文字的特徵下，人們往往望文生義，因此，我們實在不能忽略這種事實。這也就是爲甚麼中文裡意譯詞佔多數，而音譯也常常不用跟原音最接近的字音，因爲，我們實在沒辦

²⁹ 劉兆祐著，〈淺論「外來語」〉，《國文天地》，1987年6月，頁39-40。

法無視於每一個漢字的字義。³⁰

然而，意譯詞不見得能夠使純音譯詞完全消亡。舉個例子說，現代漢語曾經拿原有的詞“名學”去意譯英語的 *logic*，但是，後來卻又有了“邏輯”這個純音譯詞的創造。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名學”不能完全表達英語 *logic* 所指明的詞義，因此，純音譯詞在漢語中可有了一定的位置。純音譯詞還多出現在與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人名、地名、國名等專名(*proper name*)方面。這些專名大都無詞義可言，所以，無法採用意譯的方法。另外，有許多著名商標(*brand name*)也常採用譯音。這些商標名，或者本身無詞義而無法譯意，或者雖有詞義，然而，現已轉為專名，因此，用音譯的方式來暗示這是舶來品。還有外國貨幣與度量衡的單位，以及物理、電學上的計算單位也常用純音譯。這些表示單位的外來詞，也與專名一樣無詞義可言，所以，常採用譯音的方式。³¹從資料中找出的例子如下：

“盧比”(rupee)、“令”(ream)、“便士”(pence)、“爾格”(erg)、“品脫”(pint)、“邁”(mile)、“加侖”(gallon)、“蒲式耳”(bushel)、“西西”(c.c)、“噸”(ton)、“達因”(dyne)等。

這些表示單位的外來詞因是地道的外來事物，各國各自有一套制度，單位系統和名稱彼此很少有相同的，因此，初借入時只好採用純音譯方式。

純音譯詞總是侷限在與生活關係較密切的外來物品。例如：

“的士”(taxi)、“菲林”(film)、“巴士”(bus)、“沙發”(sofa)、“布

³⁰ 吳聖雄著，〈由詞彙的移借現象論中國語文的一種特質〉，《國文學報》，1988年6月，頁246。

³¹ 湯廷池著，《漢語詞法句法續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12月)，頁103-104。

丁”(pudding)、“撲克”(poker)、“麥克風”(microphone)、“夾克”(jacket)、“吉他”(guitar)、“咖啡”(coffee)、“可可”(cocoa)、“雪茄”(cigar)、“巧克力”(chocolate)、“白蘭地”(brandy)、“三明治”(sandwich)、“漢堡”(hamburger)等。

從以上例子中，“咖啡”(coffee)、“可可”(cocoa)、“巧克力”(chocolate)、“沙發”(sofa)、“白蘭地”(brandy)等，雖然並不符合漢字的拼寫習慣，但是，它們卻活下來了，而且還在繼續使用著。這可能是由於這些外來詞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所以，衣食住行方面的事物在人們生活中普及的速度極快。當這些新事物已經被人們耳熟能詳時，代表這些事物的外來詞便不言而喻地走進了大眾的生活中，為大眾所接受。³²

然而，純音譯詞不一定與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都有密切關係。例如“士巴拿”(spanner)只有常常接觸機器的人才會熟悉。我們並不因為缺乏絕對普遍性，便否定這個詞屬於移借的假設。其實與每一個社會成員都發生關係的外來詞，如“巴士”(bus)、“的士”(taxi)、“咖啡”(coffee)等，在整個外來詞詞彙中所占的比例並不大。³³從前的專業用語也會因為思維方式的完善，導致了原有詞彙的變化，在基本詞彙中自然地引入了一些內涵豐富、能激發人們辨味深思的哲學名詞、科學術語。現在高新技術在人們的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普遍應用，使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科技含量”大幅度提高，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使用科技詞語。因此，有些專業用語漸漸成了一般慣常用語的外來詞，例如，“休克”(shock)、“泵”(pump)等。這些哲學名詞及科學術語能否成為基本詞彙，要有時間

³² 胡曉清著，《外來語》（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頁52-53。

³³ 凡是和人類生活關係密切的事物就是基本事物，反映這些基本事物的概念就是基本概念，表示著基本事物和基本概念的就是基本詞，基本詞的總和就是基本詞彙。基本詞彙有三個特點。第一，普遍性。第二，穩定性。第三，能產性。

的檢驗，要看它與人們日常生活關係的密切度如何，要有使用範圍、頻率以及構詞能力等方面的保證。³⁴人們已經公認非要它不可了，它已經在社會生活中根深柢固了，那麼，它使進入了漢語的基本詞彙，成為基本詞彙的不可分割的構成部分，這時候，使用的人幾乎都辨認不出這是從外國來的異化成分，幾乎都不以為這是外來詞。

因為外來詞的不同，它的大眾化的時效性的強弱、大眾化持續時間的長短也不同。所謂時效性，是指外來詞在某一特定時期被大眾所接受，並被普遍使用，超過了這一特定時期，由於人們認識的改變，它又會漸漸縮小了其使用範圍，甚至會重新退縮到專業用語的圈子內。一般來講，越是與人們日常生活持續保持密切聯繫的外來詞，其大眾化的時間越長，而越是與人們日常生活保持聯繫時間較短的外來詞，其大眾化的時效性越強，為大眾所接受、使用的時間越短。舉例來說，“那摩溫”(number one)這詞，1949年前上海用來稱工頭，隨著工頭的消失，“那摩溫”這個純音譯詞也不復存在於外來詞中了。我們可以說“那摩溫”(number one)這個外來詞大眾化的時效性就很強。而另外一個外來詞“維他命”(vitamin)，因其是生物生長代謝所必須的微量有機物，所以，一旦它為大眾所熟悉、接受，就從專業走向大眾化。而這種物質因與人的生命活動息息相關，所以，它大眾化後持續的時間會很長，會長久地為一代又一代人接納。這種時效性比較弱的外來詞慢慢會喪失其行業性，被各行各業、各式各樣的人們毫不陌生地使用著，也就成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漢語基本詞彙。³⁵

然而，要注意，外來詞的時效性不見得固定的，外來詞中舊要素的消亡，只是意謂著這種詞彙在人們的日常運用中消失了，在當代社會生

³⁴ 參見葛本儀著，《語言學概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5月），頁232-234。

³⁵ 參見胡曉清著，《外來語》（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頁57-58。

活中失去了交際作用，然而，它仍然存在於語言詞彙系統中，需要時重新發揮交際職能。它們當中的多數成分，作為語言詞彙中的寶貴財富，為社會歷史及文化史的研究和語言本身的研究提供可貴的資料。每一種語言的詞彙系統，都是在這種新質要素的不斷增加和舊質要素的不斷消亡的過程中，得到豐富和發展的。

有些純音譯詞的譯音與原詞的讀音有一定的差距，這主要是方言方面的原因，比如，不少音譯詞是由粵方言和吳方言中引進的。廣州、福建、浙江、江蘇等沿海地區是早年西方傳教士、商人、冒險家和軍人進入中國的東南門戶，也是通往東北亞、東南亞和西方海上通衢的起點。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以後，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被辟為通商口岸，與西方交往逐漸擴大。如此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當一種方言具有某種特殊條件，社會上對這種方言的需求驟然增加時，這種方言的社會交際功能會迅速提高，成為強勢方言。它不斷擴大流通、擴展地盤。³⁶中國的吳方言與粵方言就是這些例子。而且，粵方言的語音系統比普通話複雜，有 22 個聲母，51 個韻母。粵語中的許多韻母是國語中沒有的，如以雙唇音“-m”為韻尾的“am”、“em”、“im”。粵語中還保留著北方話已經消失了的入聲韻母。其中以雙唇塞音“b”為韻尾的入聲韻母共有 3 個；以舌尖塞音“d”為韻尾的有 7 個；以舌根塞音“g”為韻尾的有 7 個。這使得粵方言比較容易找到發音貼近英文原詞的音譯詞，所以粵方言存在大量外來詞。³⁷現代漢語中有不少量的外來詞是由香港、廣州、廈門和上海等沿海城市的人們所創譯或在他們當中長期流行的。例如：

³⁶ 《語文學習》編輯部編，《語言大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年 9 月），頁 36。

³⁷ 吳慧堅，〈試析廣州話中的英語外來詞〉，《廣東教育學院學報》，1997 年第 3 期，頁 86。

“ ”(mark)、 “的士”(taxi)、 “菲林”³⁸(film)、 “水門汀”(cement)、 “巴士”³⁹(bus)、 “杯葛”⁴⁰(boycott)、 “噸”(ton)、 “磅”⁴¹(pound)、 “咖啡”(coffee)⁴²、 “沙發”⁴³(sofa)、 “三明治”(sandwich)⁴⁴、 “巧克

³⁸ “菲林”(film)，吳方言念做 [fi-liN]。參照《簡明吳方言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1986年5月第1版)，頁392-439。

³⁹ “巴士”(bus)，吳方言念做[po-z]。參照《簡明吳方言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1986年5月第1版)，頁392-439。

⁴⁰ “杯葛”(boycott)，吳方言念做[pe-kS/]。參照《簡明吳方言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1986年5月第1版)，頁392-439。

⁴¹ “磅”(pound)，吳方言念做[paN]。參照《簡明吳方言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1986年5月第1版)，頁392-439。

⁴² 《現代漢語詞典》裡沒有注釋，但是，馬西尼在《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裡解釋說：「19世紀，中國南方沿海地區的貿易活動，促使一些特別是從英語來的音譯詞逐漸向外擴散。最初，這些音譯詞是表示重量單位的名稱，例如，“噸”(ton)、“磅”(pound)；還有一些是在中國聞所未聞的產品名稱，例如，“咖啡”或“架非”(coffee)；還有一些用來表示特殊階層的詞語，例如，“馬占”(merchant)、“沙文”(servant)。」見馬西尼，《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頁162。

⁴³ 高名凱、劉正琰在《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裡說：「英語的 sofa[bsouf]，在其相應的

現代漢語的外來詞裡就說成了“沙發(Şāfā)”。這顯然是從上海方言的外來詞搬過來的結果。上海話“沙發”念作[safa]，這與英語的[souf]更接近。」見高名凱、劉正琰，《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2月)，頁157。

⁴⁴ 馬西尼在《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裡說：「廣州話中的 ji(之)和 xi(士)，改讀官話中 zhi(之)和 shi(士)。官話中另有兩個字，其讀音與英語 cheese

的讀音相近，這就是，計司(jisi)。“三文治”(sammenji)還保留了原來的寫法，但在

力”⁴⁵(chocolate)、“布丁”⁴⁶(pudding)、“馬賽克”(mosaic)、“凡士林”⁴⁷(vaseline)、“賽璐珞”(celluloid)⁴⁸、“摩登”(modern)、“雪茄”(cigar)⁴⁹等。

以上外來詞的讀音只能用粵方言或吳方言念才能跟外語原詞對得起來，因為，這些外來詞最初是從原有語言借到方言中，然後，再進入國語裡，因此，若用方言來讀，都比國語讀音更接近原詞。這種方言外來詞的一部分已經進入了現代漢語的日常用語，像“沙發”(sofa)、“三明治”(sandwich)、“咖啡”(coffee)、“巧克力”(chocolate)、“布丁”(pudding)、“馬賽克”(mosaic)、“凡士林”(vaseline)等。然而，“菲林”(film)、“賽璐珞”(celluloid)、“水門汀”(cement)等這些詞，現在已經很少使用，這些例子在中央研究院編的《平衡語料庫》已沒有收錄。“菲林”(film)當引進時係指電影用的軟片，目前已很少使用，改稱為“電影軟片”或攝影用“軟

官話中讀作 sanwenzhi，後來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寫法：三明治(sanmingzhi)。」見馬西

尼，《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頁180。

⁴⁵ “巧克力”(chocolate)，吳方言念做[tʃʊiŋ-kʰɿl/]。參照《簡明吳方言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1986年5月第1版)，頁392-439。

⁴⁶ “布丁”(pudding)，吳方言念做[pu-tiN]。參照《簡明吳方言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1986年5月第1版)，頁392-439。

⁴⁷ “凡士林”(vaseline)，吳方言念做[vE-zʰliN]。參照《簡明吳方言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1986年5月第1版)，頁392-439。

⁴⁸ 純音譯的這些例子外，在資料中還可以找到“水汀”(steam)、“恤衫”(shirt)等例子。

⁴⁹ “雪茄”(cigar)，吳方言讀音為[ʃiI/-ga]。參照《簡明吳方言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1986年5月第1版)，頁392-439。

片”，來指用賽璐珞做片基的感光片。“水門汀”(cement)的話，1949 年以後，創造了“水泥”這樣的意譯詞，人們選擇了“水泥”這個詞。

粵語裡音譯詞特別多。鄒嘉彥、游汝杰在《漢語與華人社會》用 16 個例子比較，純音譯詞粵語有 9 個，官話只有 5 個。他們認為文化的兼容性和詞彙輸入方式的關係是很明顯的，粵語區比處於內地的官話區較早接觸西方文化，接觸的規模也較大。⁵⁰尤其是粵語區的香港是粵語文化區的中心，香港人生活在現代的城市裡，生活的城市化程度比內地人高。而且，經過英國殖民地時期，在香港，英語所代表的社會地位不是粵語所能匹敵。⁵¹王力在《中國語法理論》說：「粵語區域的人大約因為受了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英語的影響，音譯的詞特別多，許多在國語裡是意譯的字，在粵語裡都是音譯」。⁵²像“萬事得”(Mazda，諧粵音，汽車商標)，“佳能”(canon，諧粵音，復印機商標)，“必勝客”(Pizza Hot，諧粵音，即意大利比薩餅。據說與世界馳名的澳門葡京賭場同在一座建築物的葡京酒店，經營快餐 Pizza Hut，店主抓住賭客進賭場渴望贏錢的心理，特意把 Pizza Hot 譯為“必勝客”，取個好彩頭，以吸引賭客們就餐)

⁵⁰ 鄒嘉彥、游汝杰著，《漢語與華人社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170-171。

⁵¹ 粵方言包括香港話與廣州話，但是廣州話和香港話是有點區別的。吳慧堅在〈試析廣州話中的英語外來詞〉說：「廣州毗鄰香港，兩地人民操同一方言，廣州話一向受到香港話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兩地來往頻繁，香港文化以電視、報刊等形式湧入內地，帶來了大量的新詞語。因此，廣州話在近年來又吸收了為數不少的外來詞，在口語方面更向香港話靠近，甚至也出現了使用粵英混合語碼的情況。但是，廣州畢竟不同於香港。廣州話除了受香港話影響，更深受普通話的影響。幾十年的推廣普通話工作，使各大方言區的社會成員提高了講普通話的能力。」。吳慧堅，〈試析廣州話中的英語外來詞〉，《廣東教育學院學報》，1997 年第 3 期，頁 85-86。

⁵² 王力著，《中國語法理論》(台中：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87 年 9 月出版)，頁 265。

等。⁵³如此，粵語承受外來詞衝激的結果多半是走音譯的路，廣東話本來已有的詞彙已漸失去地盤，而有被英語所取代的趨勢，自然粵語裡音譯詞很多。

另外，還想提一下“洋涇濱語”裡的詞。“洋涇濱語”(pidgin)是指“外語在當地語言影響下出現的變種。……它只有口頭形式，只用於本地人與外國人交往的特殊場合，沒有人把它作為母語或第一語言。……我們平時講的洋涇濱語通常是指 pidgin English，即隨著 18 世紀以來英國與中國沿海地帶貿易接觸的增加而形成的洋涇濱英語”。這種語言中的詞彙，由於缺乏語言邏輯，不成體系，無詞法、詞音、詞意系統可循，並不用於一族內部的交往，而僅用於異族間的交往，因此，總的說來，並不屬於外來詞。但是，有些洋涇濱英語裡的詞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也進入了當地的語言，並成為基本詞彙被固定下來。這在中國廣東、福建等地是常見的。而且，這些詞大多是在成為洋涇濱語時當地人誤讀外語原詞發音所形成的，它們有些至今仍活躍在方言中，甚至有的在標準語中也有所見。如“芝士”(cheese)、“三文治”(sandwich)等。因此，有的學者認為這類詞是音譯詞的前身。

總結來說，外來詞的處理方式要受語言本身結構及社會文化現象等因素的操縱。在文化交際的過程中，方言是有可能產生外來詞的，特別是廣東、福建、江浙沿海各省，因對外貿易和發展較早，出外華僑眾多，因而，吸收外來詞的機會比較多。

歷史漢語外來詞中音譯詞的比例要大於現代漢語外來詞中音譯詞的比例，諸如來自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菩薩”、“羅汗”、“閻

⁵³ 陳建民著，《漢語新詞語與社會生活》(北京：語文出版社，2000 年 7 月第 1 版)，頁 36-37。

羅”，來自少數民族的“胡同”、“戈壁”、“搭襪”、“達賴”、“哈達”、“喇叭”均為音譯詞。⁵⁴這些外來詞經長期使用後，在形式上已不知不覺失去了外來詞的面貌。古人在記錄這些音譯詞時，和現代音譯詞有些不同，很多不是選用現成的漢字，它們都是因翻譯需要而造的形聲字。漢字的構造形式中形聲字居多，它一般由兩個字符構成，一個示義，一個表音。這種形兼音義以記錄語詞的方式，信息量大，孳乳力強，使形聲字早在《說文解字》時代就多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而成為漢字的主體。因此，當漢語吸收外語原詞時盡可能根據原詞語的語音選擇一個意義可以融合於一體的形聲字，讓人從形聲字的形旁中得到關於該詞語意義的啓示，以至表面看來似乎是漢語的固有詞，而不是外來詞。例如，“蒲陶”到唐代寫作“蒲桃”（見《吐魯番文書》），南宋寫作“蒲萄”（見《全勞備祖》），到李時珍著《本草綱目》時已變成“葡萄”。又如“瑪瑙”，《魏書·西域傳》尚作“馬腦”，在《舊唐書》則為“瑪瑙”（《隋書》作“碼瑙”）。“袈裟”、“喇叭”、“茉莉”、“琵琶”、“琉璃”、“葡萄”、“苜蓿”等，在外來詞傳入之前，字書中原本沒有這些字，因翻譯需要而造了出來。它的主要目的不是原詞意義的表達，而是為了使讀者在看到這個外來詞的書寫形式時，在通過語音形式感知外來詞詞義的同時，還能通過字面意義產生某種聯想。

這種方式擴大了此法的使用範圍，增加了它的積極意義，對近、現代翻譯有很大影響。例如，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書方法就有“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為新名，仍讀其本音，如鎂、鉀、矽等”。⁵⁵在資料中可以找出以下的例子：

“磅”(pound)、“鎊”(pound)、“咖啡”(coffee)、“嗎啡”(morphine)等。

⁵⁴ 李文平著，〈漢語外來詞古今比較與反思〉，《吉首大學學報》，1998 年第 3 期，頁 38。

⁵⁵ 馬祖毅著，《中國翻譯簡史》（增訂版）（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 年 6 月第 1 版），頁 233。

英語的 **pound** 一詞有兩個意思，一個是重量單位，一個是貨幣單位。而漢語在吸收外來詞時將重量單位的 **pound** 用“石”旁的“磅”來指稱。“石”旁的“磅”可以引發人們關於重量的想像，而“”旁則直指貨幣的核心。這樣在外語原詞中完全表音的一詞雙義在漢語中通過形聲字的意化作用得到了明確清晰分辨與詮釋。再如，“咖啡”（**coffee**）的“咖”字，康熙字典沒有收錄，是近世為翻譯 **coffee** 這個詞所造的新字，辭源說「咖讀如加」，已與現代讀音不同了。“啡”字則自古就有，不過讀音不一樣。現在則把“啡”字用作“咖啡”（**coffee**）、“嗎啡”（**morphine**）等的譯音字，讀音“非”。⁵⁶除此外還有“咖喱”（**curry**）、“啤酒”（**beer**）、“噸”（**ton**）等的例子。從以上“咖啡”（**coffee**）、“嗎啡”（**morphine**）、“咖喱”（**curry**）、“啤酒”（**beer**）、“噸”（**ton**）等的例子，我們可略略看出，漢語中這一類“口”字旁的字，常用來音譯，由這類字構成的詞，不但沒有“字義干擾”，而且還能表明它們指的事物為外來的。

其實，用“口”字旁的字來音譯外語詞，其歷史已是悠久了，在源自梵語的佛教音譯詞中就有這類字，例如，“波吒”（**Vasistha**）、“波哆迦”（**pataka**）、“播囉弭多”（**paramita**）等。可見這類字的使用確實是很早的，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帶“口”字旁的音譯字，是漢字受外來影響的標記。⁵⁷

總結說，許多純音譯外來詞實際上與文化及科技文明有相當大的關聯，人名、地名多不勝數，科技術語和商品名也是層出不窮，從“米”（**meter**）、“打”（**dozen**）、“磅”（**pound**）、“噸”（**ton**）這些度量單位到“柯達”（**kodak**）膠卷和最新的“克隆”（**clone**）技術，外來詞已進入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不少已進入漢語的基本詞彙，如“沙發”（**sofa**）、“撲

⁵⁶ 《國語日報外來語詞典》（台北：國語日報社，1986年5月第1版），頁241。

⁵⁷ 參見黃河清著，〈漢語外來影響詞〉，《詞庫建設通訊》，1995年8月第7期，頁19。

克”(poker)、“坦克”(tank)、“雷達”(radar)等，其外來淵源已被淡忘。這些文化或文明上的外來詞代表的是一種新的發展，新的趨勢，新的觀念，要去抗拒它實在是非常困難，這也許就是為甚麼流行的外來詞相當多的原因。

貳·半音半意譯

在英語中，幾乎所有的外來詞都通過純音譯而產生。所謂純音譯，即只紀錄一個外來原詞的發音而沒有任何意思上的翻譯。當然也有一些例外，如，英語 taoism 來自漢語“道學”，它是半音半意譯的。然而，在英語中，除個別外，大部分是通過於音譯而產生的。

而漢語中，當然，也有通過於純音譯而產生的外來詞。音譯固然有簡便、對等，免去兩種語言運用時頭腦中的轉換切合等特點，它使中國人缺乏的新概念能夠及時輸入，為漢語及時提供服務。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它的不利之處，即抽象的術語在剛進入漢語領域時給人帶來的突兀陌生之感，以及複雜音節的拗口講法，在人們心理上引起排斥反映。因此，這樣洋氣十足的音譯詞中的相當一部分是用音譯和意譯結合的方法而被漢語引進，就是半音半意譯。這種半音半意譯方式構成的外來詞，音譯的部分是外國獨特的名稱，意譯的部分是中外皆有的事物。比如，“千克”(kilogram)、“千瓦”(kilowatt)、“分貝”(decibel)等。這些半音半意譯詞，因為在音譯部分仍不符合漢語的傳統構詞習慣，僅能靠意譯來負載一部分詞義，即意譯的音節能表達一部分意義，是聚性關係，而音譯的音節則無此功能，是散性關係，只有少數半音半意譯詞，因存有音意兼譯的情形，如“迷你裙”(mini skirt)、“霓虹燈”(neon sign)等，這種半音半意譯的方式符合漢語的構詞法，故採用此種半音半意譯的外來詞流傳性相當廣。從資料中可找出以下的半音半意譯的例子：

“拓撲學”(topology)、“珂羅版”(collotype)、“華爾街”(wall street)、“迷

你裙”(miniskirt)、“霓虹燈”(neon sign)等。

這類詞，在音節數目上以多音節為主。一般地講，三音節以上居多，這是由於音譯部分仍是以二、三音節居多，但是，因增加了意譯部分，故整個詞的音節拉長了。雖然，半音半意譯詞的音節拉長了，可是，不像三音節以上的音譯加類名詞意譯部分經常省略，半音半意譯詞的意譯部分極少有省略者。⁵⁸這可能與意譯部分的辨義作用有關，爲了使意義更明確，不願爲遷就音節而省略。

參·音譯加類名

一俟音譯詞的概念爲中國人所吸收，或者他們生活中音譯詞所代表的事物、概念爲大眾所熟悉，人們目光的聚焦點則從語詞的意義轉向形式，這時必然會覺得這些充滿異國氣味的音譯詞不符合中國人的口味，需要對其重新加工包裝，將其同化於他們的漢語。

大多數漢語詞的詞義往往和字義有某種聯繫，所以，人們在用漢字對譯外來詞時習慣於兼顧漢字的表義作用。人們總是希望對譯漢字能給讀者提供一點理解外來詞的線索，然後由這個線索直接或間接地把握外來詞的真正涵義。因此，每當一個新的外來詞出現時，人們總習慣地期待在其字形上能顯示出某種意義，不僅容易記憶，又便於接受。在這樣的背景下，音譯加類名法就應運而生了。

音譯加類名不同於半音半意譯之處在於，半音半意譯詞的音、義成分都直接來源於外語原詞，吸收外國語時只是對原詞的不同部分採取了音譯與意譯的不同處理辦法，而音譯加類名詞只有音譯部分源於外語原詞，後邊的表意部分是漢語在創造吸收外來詞時爲了表意清晰化而綴加

⁵⁸ 詳文請看音譯加類名部分。

的。將外語原詞音譯過來，然後再加表示類別的漢語語素，其中有許多詞音譯的部分也不是簡單的記號，所用的語素或詞同原義有一定聯繫或可以使人產生聯想。比如，“大麗花”(dahlia)的“大麗”這兩個字給我們大而且美麗的形象。還有“保齡球”(bowling)，又有讓人喜愛的含意，給人一種保持青春不老的意味。這些例子的音譯部分與原義都具有一定的聯繫。

音譯加類名的外語原詞是一個單詞，意譯部分是另加的，並可省略。例如，“高爾夫球”(golf)、“卡片”(card)、“恤衫”(shirt)、“吉普車”(jeep)、“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s)等。這些詞中的“球”、“片”、“衫”、“車”、“運動會”等都是漢語原有的詞素，用來表意，若不加後面那個表意詞，如“吉普”(jeep)本身就是“吉普車”的意思，只是初譯時怕人費解，便加上了“車”這個容易理解的漢語詞，使人明白這是一種車子。語言總是向簡練方向發展的，現代漢語的特點之一是多音詞漸向雙音詞轉變，因而，這些外來詞經長期使用，其表意部分漸成多餘或並不十分必要，像“威士忌酒”(whisky)、“坦克車”(tank)、“雪茄煙”(cigar)、“撲克牌”(poker)等，已經經過這些變化變成了純音譯詞，就是“威士忌”、“華爾滋”、“坦克”、“雪茄”、“撲克”、“雪茄”等。⁵⁹⁶⁰

但有些詞的意譯部分卻不能省略。它又可分作下面幾類。

⁵⁹ 張德鑫著，《中外語言文化漫議》(北京：華語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76。

⁶⁰ 這種雙音化傾向一方面固然與漢語本身特點有關，但另一方面也與中國人偏愛雙數的文化習慣有關。對於中國人來說，雙數意味著吉祥如意，幸福美滿。“二”意味著“夫妻成雙成對”，“四”象徵著“事事如意”，“六”有“順利”之意，“八”有“發財、發達”的內涵。中國人選定兒女婚嫁等喜事日期時，總是選擇雙數日期，就連春節出門訪友也偏愛雙數日子。胡開寶著，〈英漢商標品牌名稱對比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頁119。

1. 音譯部分是一個單音節漢字，爲了適應漢語構詞中單音詞擴爲雙音詞的特點，附加上表意成分的另一個單音節漢語語素，正好變成雙音詞。例如，“啤酒”（beer）、“卡車”（car）等。
2. 若去掉表意成分，其意費解。例如，“卡賓槍”（carbine）、“達姆彈”（dumdum）等。
3. 若去掉表意成分，會產生誤解。如英語中表示某一民族和語言的詞往往是同一個，Indian 可譯作“印第安人”或“印第安語”，Eskimo，可譯作“愛斯基摩人”或“愛斯基摩語”等。若把這些詞中的表意成分“人”或“語”省掉，就會造成混亂。還有“爵士樂”（jazz），如果把“樂”省掉的話，可譯作“爵士”（sir）或“爵士”（jazz），例如，“斯龍（Hans · Sloane）爵士個人的收藏”，“唱片中還有爵士曲風的聖誕音樂”等很容易引起誤解。⁶¹

音譯加類名詞的表意部分亦有前置與後置兩種。一般的情況下，以後加類名的形式較爲常見，然而，還有前加類名的形式，比如，“車胎”（tire）、“酒吧”（bar）等皆屬於前加類名的。另外，還有所謂的“頭字詞”（acronym）並附加類名的情況，即先將原詞縮略成若干字母音譯，再加上類名補義，比如，“頂客族”（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愛滋病”（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等，這些大多是取各字的頭一字母組合音譯，然後，漢語將字母縮略詞用讀音近似的漢字表示出來，再加上一個表一類別的詞。

以上，音譯加類名詞是由外來成分和漢語成分共同構成的詞語。它所反映的是漢語社會中的新事物，絕大多數與外來事物有關。除了含有人名與地名的英語原詞以外，還包括度量單位，以及飲料、食物、動物、

⁶¹ 參見《平衡語料庫》。

車輛、工具、舞蹈、音樂、球賽等的名稱。在這些音譯加類名的意譯部分都表示類名，兼有辨意、補意與加長音節的功能。因此，音譯加類名詞都是雙音詞或多音詞。“卡車”表示“car”，“啤酒”表示“beer”，而“酒吧”則表示“bar”，雙音節的音譯加類名詞，其譯意部分常不能省略，而三音節以上的音譯加類名詞，其譯意部分則常可省略，例如，“威士忌(酒)”(whisky)、“白蘭地(酒)”(brandy)、“坦克(車)”(tank)、“吉普(車)”(jeep)、“高爾夫(球)”(golf)等，我們可以說有些音譯加類名詞的產生似乎與漢語詞彙的雙音節化有關。⁶²然而，其類型尚處於發展變動之中，哪些音譯加類名詞的意譯部分可以省略，還需等待時間的檢驗。但是，隨著中外科科技、經濟、文化交流的增多而發展，這類音譯加類名詞無疑將生存並發展下去。

肆·音意兼譯

在引入中國所無的新生事物時因在漢語中無法找到對應詞，只好借助音譯或意譯的方式，但是，無論是音譯，還是意譯都有其片面性。音譯只重語音翻譯，無法顧及到詞義，而意譯根據詞意翻譯，不考慮語音。爲了彌補這些缺點而產生的辦法就是音意兼譯。眾所周知，不管是中國譯論者，還是西方譯論者，大都認爲好的翻譯應最大程度地忠實於原文，如嚴復的“善”，尤金·奈達的“動態對等”等。⁶³音意兼譯可以說最符合於

⁶² 湯廷池著，《漢語詞法句法續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12月），頁116。

⁶³ 嚴復是一位成就卓著、影響深遠的思想家。他爲漢民族所作的主要貢獻，是帶來了一種新的世界觀。而他的這一偉大貢獻，正出自他的翻譯事業。他選擇翻譯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名著作爲終身事業，有著高尚而明確的目的。嚴復主張“真”、“善”、“美”原則。“真”——音譯時，應以譯音準確爲第一目標。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就要避免語音的模擬因個人對原詞的不熟悉而造成錯誤。另外，還要避免語義的表達需要而扭曲了語音的正確性。“善”——在“真”的前提下要講求“善”的效

這種要求。

受漢民族善於聯想的心理的影響和制約，中國人一向喜歡文字遊戲，既不易接受純音譯，對意譯也不完全滿意，總希望能兩者兼顧，使漢語外來詞具有其獨特的一面，即在保持語音同外族原詞近似的條件下採用同漢語語素諧音的方法，以便在不同程度上與原詞意發生某種關係。然而，音意兼譯，這種方式仍然屬於音譯範圍，這類詞是以原詞的讀音為前提，然後根據該詞所指事物的某些特徵，選擇適當的漢字，加以重新命名，這一點我們要注意。

音意兼譯需要一邊顧音一邊顧意，往往導致兩者都顧不全的結局。顧意，有的聯繫很緊密很直接，同意譯差不多，但是，大部分聯繫是間接曲折的，有的甚至還是牽強附會的，或只是為了逗樂，在這一點上它們很像純音譯詞。⁶⁴顧音，也只是拿相近的語音，甚至於只在某種發音部位或發音方法上有點類似的語音，來代替原詞的發音法，而不能按照嚴格的對應規律來發音。比如，“烏托邦”(utopia)是音意兼譯詞，可是“邦”音因為要諧意乃有相當勉強的感覺。

音意兼譯同時要顧音和顧意，如果達不到理想的程度，從而發生誤導。例如，“嬉皮”(hippie; hippy)，這音意兼譯詞無法確切表達 hippie 的詞義內涵，且有可能造成誤解。雖然“嬉皮”(hippie; hippy)他們對當時的社會現實不滿，生活方式與眾不同，頭蓄披肩長髮，身着奇裝異服，

果，即為符合漢語名實之間的統一，調整形式來適應形義之間的關係。因此，對外來詞應盡量意化，使它們帶有漢語詞彙的特徵和色彩。“美”——美學心理乃文化心理的反映。從豐富浩瀚的漢語文學藝術中，往往可透顯出一種簡約、含蓄、優雅的美學傾向。表現在語言也是如此，然而，當漢語像外語借詞時，卻往往因缺乏規範而顯得混亂，所以，外來詞也應受到這種“美”的規範。

⁶⁴ 參見史有為著，《漢語外來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1月），頁104-107。

沉迷於酗酒吸毒，但是，他們並非都是“嬉皮笑臉”的人，其中不少人對社會問題持有嚴肅的態度。

由此可知，音意兼譯可以說是一種複雜的譯法。音意兼譯法是標準不一，音譯和意譯成分要各自達到如何地步才能貼切，可以說完全訴諸譯者的主觀。而且爲了兼顧，需要很多的功夫和時間。也因爲如此，普遍接受性比較弱，能廣爲流傳的並不多。⁶⁵有人認爲音意兼譯應避免，以免弄巧成拙，或增加不必要的聯想。不過，漢字是“標義文字”(ideograph)，由於漢字拙於標音，長於表意，帶有表意傾向的記音，是合乎語用者的心理要求的，也是自然的結果。⁶⁶我們不難發現，終於進入漢語基本詞彙的音譯詞大半是音中有義的音意兼譯詞。同時，漢語裡的“同音字”(homophone)相當多，在一音多字的情況下可供選擇的同音字不少，自然而然也就會顧慮到字義上的配合。因此，經過這種費力的引進過程而被漢語引進的音意兼譯詞，它即使是音譯詞，也使人在語感上覺得它是個漢語詞。以下是音與義結合得較爲緊密和諧的例子：

芒果(mango) — “芒”字的“ ”使人聯想到植物，同另一諧音譯的“果”配合後，幾可混同固有詞。⁶⁷

俱樂部(club) — 一望文生義就知道是「大家俱在那裡娛樂的地方」。⁶⁸

⁶⁵ 魏岫明著，《國語演變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年6月，頁75。

⁶⁶ 參見姚榮松著，〈台灣現行外來語的問題〉，《師大學報》，1992年6月，頁343。

⁶⁷ 參見史有爲著，《漢語外來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1月），頁104-107。

⁶⁸ 吳聖雄著，〈由詞彙的移借現象論中國語文的一種特質〉，《國文學報》，1988年6月，頁240。

引得(index)－使人聯想到「引導而得之」。⁶⁹

邏輯(logic)－“邏”是巡查之意，帶有按一定的路線行動的意味，“輯”是編輯之意，也隱含著按一定次序行動的意思。這二字同“思維的規律”不無隱約的聯繫。⁷⁰

幽默(humor)⁷¹－《現代漢語詞典》解釋說：「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長。」從這意義可以聯想到「你看!會說笑話的人不是自己不笑，讓人家笑嗎?『幽默』就是他既幽又默嘛!」⁷²

托福(TOFEL)－不少青年把通過它當作是去國外學習的一條必要的途徑，所以就把未來的幸福寄托在通過“托福”(TOFEL)考試上了。⁷³

席夢思(simmons)－使人聯想到「在此種床上容易入夢安睡」。⁷⁴

維他命(vitamin)－可聯想到「不僅維持他的命，也維持你我的命」。

⁶⁹ 姚榮松著，〈台灣現行外來語的問題〉，《師大學報》，1992年6月，頁343。

⁷⁰ 史有為著，《漢語外來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1月），頁104-107。

⁷¹ 中文從前原已有「幽默」這個詞，意思是「深靜」。楚辭九章懷沙：『孔靜幽默。』這與現在音譯的「幽默」扯不上關係，所以音譯 humor 的「幽默」應視為純粹音譯。

⁷² 吳聖雄著，〈由詞彙的移借現象論中國語文的一種特質〉，《國文學報》，1988年6月，頁240。

⁷³ 伍卓著，〈試論外來詞的使用與翻譯〉，《山東師大外國語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頁84。

⁷⁴ 參見鄒嘉彥、游汝杰著，《漢語與華人社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頁180。

幽浮(UFO)－它是不明或未確認飛行物體，“幽”的意思是闇、隱，“浮”是浮在空中，或飄浮不定，音譯得很像。⁷⁶

基因(gene)－可以理解為「基盤的因子」。

像“邏輯”(logic)，即在音節構造、詞形等方面已經完全符合漢語的語文規範的外來詞。這些詞一般人已經把它們當作本語言固有的詞而不覺得是外來詞。有些詞甚至進入了漢語的基本詞彙，可以用來構成新的復合詞或派生詞了。

反而，有的音意兼譯詞，音、意之間關係較為松散，即各個意化音節之間的關係不符合漢語傳統構詞方式，意義上無法凝聚成一個意義，只是通過相應字眼給人以暗示，留下一個可以玩味的意義空間。這類詞雖不能直接由漢字組合中了解原詞的涵義，但是，仍盡量運用接近原外來詞所指稱事物或概念的形象之字眼，讓讀者能從漢字的字面意義上迅速把握原外來詞所指稱事物或概念的形象特徵，進而聯想其所指稱的概念內容。⁷⁷例如，“滴滴涕”(DDT)從文字形式“ ”上我們可以想見這是一種液體，也透露了烈性藥劑的信息。這種聯想義與“滴滴涕”一詞的原義相差無幾。再如，“雷達”(radar)對它們字面的理解可以是「像雷一樣快就達到」。

⁷⁵ 吳聖雄著，〈由詞彙的移借現象論中國語文的一種特質〉，《國文學報》，1988年6月，頁240。

⁷⁶ 李南衡著，〈外來語索隱〉，《新書月刊》，1985年8月，頁37。

⁷⁷ 參見吳致君著，《漢語借詞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頁23。

這種憑藉某些漢字從字面意義聯想而來的詞義只是隱約的，含糊的，讓人玩味與沉吟的。這些外來詞，在音節構造、詞形等方面仍然帶著明顯的外語特點、面貌還很不像漢語，和漢語的純音譯詞有很大的相似點，它們之間的差異不太明顯。將來，很可能有許多純音譯詞經過聯想的過程歸於音意兼譯詞。譬如，“三明治”(sandwich)，現在，不少人認為“三明治”(sandwich)一詞很像三明治，音意兼譯，實在妙不可言。然而，它本是純音譯詞，後來有些人把“三”看做表意詞，於是，把兩片麵包夾肉的叫“二明治”。⁷⁸還有些人將“坦克”(tank)、“休克”(shock)列入純音譯之類。可是，有些人可能從中聯想到“坦克”(tank)能“坦”地“克”敵，“休克”(shock)中的“休”即止，它們在字面上可能也含有意義。因此，這些純音譯詞使用一久，容易讓人覺得這些詞譯得很恰當。

其實這種望文生義的心理作用是受時間與空間限制的。在空間上，同樣一個概念用甚麼字來表達最恰當，毫無標準可言，中文說“語言”日文說“言語”，中文的“言語”等於日本的“鹽葉”。英文的 diet 國語說是“節食”，似乎不如台山話的“制肚”。在時間上，有許多外來詞，尤其是歷史已達一千年以上的外來詞，初看是頗有意思的意譯詞，實際上當初輸入時原是道道地地的音譯詞（如“一刹那”）。同樣一個概念用甚麼字來標義最妥當，往往是見仁見智，我們只能等待時間的審判。⁷⁹

這裡特別要指出“俱樂部”(club)一詞，因為，它還表明中文的詞彙擴展過程中除了面臨梵文及歐美語文的衝激外，清末民初時又面臨著日本的大量科技用語及日常用語的沖激。1840年，西方列強率先以鴉片加堅

⁷⁸ 梁實秋、黃宜範、施翠峰著，〈中國語文中的外來語〉，《綜合月刊》，1972年5月，頁26。

⁷⁹ 黃宜範著，《中英翻譯：理論與實踐》（修訂版）（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6月修訂1版），頁103。

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一方面，隨著西方文明的闖入，大批源於英語及其他語言的外來詞開始湧入漢語，另一方面，鴉片戰爭打開了先進的中國人的眼睛。中國開始有知識分子走出國門，到歐美、日本去留學。

在這一時期，中國早期留學生，以留學日本的居多，他們很自然地將日本的外來詞搬到中國來，所以，來自日語的外來詞在當時占了極大比重。日語曾從中國借用了大量漢字，但是“西學東漸”時許多西方語詞經日本“漸”到中國。明治維新後，日本從西歐吸收了大量語詞，其中有許多是用漢字書寫的，並又倒流回漢語。宿久高在〈識論語言交流與生活、文化形式變異之關係〉中說：「對於現代日本人來說，和歷史上中國語言、文化的傳入相比，明治維新後的西方語言的大量湧入，更大程度地對日本人的生活及文化形式產生了影響。...如果說古代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對日本的影響主要在於思想、文化和精神史層面的話，那麼，近代西方語言和文化的傳入對日本的影響，更多的應該說是思想和大眾生活層面的。」⁸⁰

由於這些外來詞利用漢語的讀音，完全看不出日本語的色彩，故這類外來詞常難以辨認和確認。因此，甚至有的學者主張來自日語的外來詞不是真正的外來詞。王力認為，日語翻譯西洋詞語的漢字詞在漢語中並不是外來詞，他說：「我們不應該認為是漢語向日本語“借”詞。這些詞並不是日本語所固有的，它也不過是向西洋吸收過來的，就一般說，日本原有的詞我們並不需要借，因為只有新概念才需要新詞，而新概念並不是日本原有的詞所能表示的。日本人創造了一些新詞來表達西洋傳到日本去的那些新概念，我們只是利用日本現成的翻譯，省得另起爐灶罷了。」⁸¹這種對於西洋語言的間接轉借，是透過使用漢字進行譯借的日本語才有可能，漢語借進來的只是日譯漢字的形義，並不借用日本漢字

⁸⁰ 盧國屏主編，《文化密碼—語言解碼：第九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年7月第1版），頁323-324。

⁸¹ 王力著，《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6月第1版），頁519。

的音讀，因此，有人將這種特殊的「借字不借音」現象，稱之為「形譯詞」，或者說那是「日本譯名的借用」。⁸²關於「取締」、「引渡」等純粹向日本語借用的詞，王力認為：「這還不算純粹的借詞，因為沒有借用它的語音」⁸³

丹麥語言學家 Otto Jespersen 在其《語言及其本質、發展和起源》一書中對“借詞類別”所作的比喻：「在許多語言混雜當中各種各樣的成分仍然是很清楚的，並且可以分開，就好像把一副撲克牌洗好後還能挑出紅桃、黑桃等一樣；但在英語和斯堪的納維亞語的情況下，我們卻有一種更微妙的、更密切的混雜，就像把一塊糖放在一杯茶中，幾分鐘後，就很難說哪是茶、哪是糖了。」⁸⁴高名凱、劉正琰等編的《漢語外來詞詞典》，頗能兼顧日語來源的漢語外來詞，劉正琰在序中指出「我們在處理日語來源的漢語外來詞時就有杯中糖茶交融之感了。中日文化交流歷史悠久，語彙相互借用的情況錯綜複雜，而文獻浩繁，限於人力，勢難一一考究其借用時間之先後，只有充分參考中日兩國專家的研究成果，有關論著和辭書，對我們所收的詞條一一反覆查核對，比較分析，恪守“披沙揀金、寧缺勿濫”的收詞原則，端正“想當然耳”的治學態度，才能避免“指鹿為馬”的錯誤。」⁸⁵他們都表明來自日語的漢語外來詞猶如杯中茶糖交融，混然一體而難以辨認。

這類來自日語的外來詞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

1. 借用古漢語的詞去意譯歐美語詞，譯詞的意義跟古漢語原詞意義不盡相同或完全不同，然後，再被借回漢語。《周易·革》說：“湯、武革

⁸² 姚榮松著，〈台灣現行外來語的問題〉，《師大學報》，1992年6月，頁333-334。

⁸³ 王力著，《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6月第1版），頁526。

⁸⁴ 轉引張德鑫著，《中外語言文化漫議》（北京：華語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90-192。

⁸⁵ 劉正琰、高名凱、麥永乾、史有為編，《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頁3(序言)。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⁸⁶古漢語中的“革命”意味著改王朝，可是，現在的意思是意譯英語 revolution 的。例如，“經濟”(economy)、“共和”(republic)、“保險”(insurance)、“革命”(revolution)、“文化”(culture)、“環境”(environment)、“保障”、“悲觀”、“標本”、“表象”、“博士”、“博物”、“處女”、“單位”、“單行”、“法庭”、“法則”、“反對”、“方程”、“分配”、“攻守”、“規範”、“國體”、“機關”、“記錄”、“交通”、“階段”、“精神”、“課程”、“會計”、“理論”、“理事”、“美化”、“民法”、“內閣”、“鉛筆”、“上水”、“生產”、“時事”、“水準”、“思想”、“天主”、“同志”、“文明”、“新聞”、“信用”、“性能”、“訊問”、“支配”、“主人公”、“主義”、“組織”、“主席”等。

2. 利用漢字創組新詞意譯歐美語詞，再被漢語借來。此類為數量多，但是，很難與第一類區別。例如，“傳統”(tradition)、“企業”(enterprise)、“金融”(finance)、“抽象”(abstract)、“批評”(criticize)、“經驗”(experience)、“對象”(object)、“原則”(principle)、“文學”(literature)等。
3. 借用漢字表示日本固有事物和概念的純日語詞彙，可稱真正含有外來詞的特徵，但是，語音、語義皆屬日語系統，漢語借其形、義，改用漢語來讀。例如，“見習”()、“手續”()、“場合”()、“立場”()、“取締”()、“物語”()、“辯護士”()、“歌舞伎”()、“柔道”()、“權益”()、“花道”()等。⁸⁷
4. 利用漢字音譯歐美語詞。這種音譯詞的漢字日本人叫“嵌字”。這是日本人早期借用漢字音譯外來詞的方法。比如，“金剛石”(diamond)、“俱樂部”(club)、“瓦斯”(gas)、“曹達”(soda)、“混凝土”(cement)、“淋巴”(lymph)、等。

⁸⁶ 《周易》(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初版)，頁111。

⁸⁷ 胡曉清著，《外來語》(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頁15-16。

5. 模仿漢字字形創造的漢字。日本自創漢字意譯歐美語詞或音譯歐美語詞。這些新詞被移用到書面漢語中，既是新的外來詞。如，“噸”（ ）→“噸”、“腺”（ ）、“癌”（ ）、“尺”（ ）→“呎”、“里”（ ）→“哩”、“寸”（ ）→“吋”等。原來每個漢字只代表一個音節，然而，這類外來詞只有一部分卻代表兩個音節，如“呎”讀作“英尺”，“哩”讀作“海里”，打破了單音節漢字的老規則。但是，這類新字因不合漢字讀音的習慣，已在逐漸淘汰之中，如“呎”、“吋”已經廢棄，不過，代表單音節的新字，如“腺”（ ）、“癌”（ ）等還在漢語中常用。

我們曾說過，漢語中有一類“口”字旁的字，常用來音譯，由這類字構成的詞，不但沒有“字義干擾”，而且，還能表明它們指的事物為外來的。漢語引進日語來源的外來詞也使用這種方式，以上的“噸”（ ）→“噸”、“尺”（ ）→“呎”、“寸”（ ）→“吋”、“里”（ ）→“哩”等都是這些例子。只有日語“里”（ ）引入漢語時，增加“ ”變成“哩”是特殊的。

現代漢語外來詞中以日語來源的外來詞佔大多數，而這些外來詞又以反映西洋文化內容的詞語佔大部分，這種情況既說明現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遠遠走在中國前頭，還說明日本是近現代中國接受西方文化的轉駁地。⁸⁸

⁸⁸ 韓國也在 100 多年前被迫割讓給日本，到現在延續使用不少日語外來詞，同時從日語中輸入的現象也並未中止。其中有的是日語先音譯歐美語詞而從英語中引進外來詞，然後，韓語再利用韓字音譯日語外來詞。如下：

英語	日語	韓語
apartment	-	
ball point pen	-	
mass communication		

音意兼譯詞中有一些由數個詞的頭一個或頭幾個字母合併而成的“頭字詞”(acronym)。這些“頭字詞”中，有些從譯音的詞可以聯想到事物或概念的形 象 特 徵 。 例 如 ， “ 托 福 ”(TOEFL<T(est)o(f)E(nglish)a(s)F(oreign)L(anguage)) 、 “ 雷 達 ”(<radar<ra(dio) d(etecting) a(nd) r(aging)) 、 “ 雷 射 ”(laser<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 、 “ 幽 浮 ”(UFO<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 “ 聲 納 ”(<sonar<so(und) na(vigation) r(ange)) 、 “ 滴 滴 涕 ”(<DDT<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等。這些“頭字詞”之產生本來是由於原名過於冗長，所以，輸入漢語時也就沿例譯音而不譯意，而因漢字的表意特徵，引進這些詞時往往考慮到詞的意義，因此產生了這些“頭字詞”。

對於音譯這些“頭字詞”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隨各字母發音逐字音譯，如 DDT 譯成“滴滴涕”，另一種方式則是按拼音方法的讀音音譯，例如，sonar 譯成“聲納”，“托福”(TOEFL)等。至於採取何種方式音譯，主要根據英語對此類詞的讀音。徐進在〈英語首字母縮略詞漢譯初探〉⁸⁹裡表示，由於英語本身對單詞音素組合的種種限制，大多數的字母縮略的讀音方式多採取前一類。

總結說，音到意隨的音意兼譯詞，雖然數量不大，而且，爲了達到理想的程度，需要滿長的時間，但是，能反應出漢語的創造潛能。用這種方法引進的外來詞，一般能融入漢語基本詞彙，使漢語詞彙不斷豐富。隨著中外交流的日益擴大，尤其是商標品牌中，例如，“百事可樂”

⁸⁹ 徐進、陸曼娜著，〈英語首字母縮略詞漢譯初探〉，《揚州師院學報》，1990 年第 2 期，頁 67。

(pepsicola)、“標緻”(peugeot)、“可口可樂”(coca cola)、“拍立得”(polaroid)等等，爲了形象及廣告效果，在音譯時，力求意義上的貼切，這一類外來詞彙無疑呈上升趨勢。

伍·外文字母詞

由於英語和漢語的差異以及使用者認知習慣、文化背景、思維方式等的不同，外來詞在由歐美語言系統轉移到漢語系統的引進過程中，內部形式發生了變化。可是，最近新引入的外來詞不經任何加工而直接以外文字母或用外文字母與漢字一起構成新的爲中國人所接受的外來詞。儘管外文字母詞以前曾進入過漢語，但是，由於數量較少，使用領域窄，所以並未對漢語形成大的影響。然而，近年來，這種夾用外文字母的現象，越出了科技領域，廣泛運用於社會經濟、文教體育、日常生活等各個方面，其數量之多，使用頻率之高，是前所未有的。

利用漢字記錄音譯詞，即使詞意與字面意義相去甚遠，人們也總有一種認同感，而對於外文字母詞是否屬於漢語系統詞彙有人提出置疑。然而，我們應當看到，外文字母形式在漢語中異常活躍的現象不是憑空生成的，它也有著其適當的語言內部的契機與合適的心理土壤。例如，DNA，意譯全名爲“脫氧核糖核酸”、CT 意譯名稱爲“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B 超叫“B 型超聲診斷”，如此繁複的漢語譯名除非專業人員，普通人很難記住它們。每種語言在增加新成員時都要求它盡量簡潔明快，漢語這種以雙音節詞居多的語言更是自然會排斥那種一長串文字組成的譯名，因此，這些詞的意譯詞一開始就注定會遲早消失。

人們舍繁就簡的心理也使外文字母詞參與漢語的構詞方式順利地得以實施。尤其是年輕一代本來沒有豐富的民族傳統文化底蘊，中國既有文化概念、思維習慣一時還無法讓他們形成穩固的心理定勢，他們的心理還處於一種活潑多變的狀態之中。因此，面對新鮮事物的刺激他們

非但不會反對，反而會舉雙手贊成。⁹⁰再來，中國發展現代經濟、開拓國際市場，新概念、新事物不斷出現，自然而然引進了 WTO、IBM 等外文字母詞，來追求國際交流上的便利。

漢語中外文字母詞採用的主要是拉丁字母，這取決於拉丁字母本身的優勢。英語是世界通用語，是世界上認識量最大的字母形式。⁹¹另外，也有少部分採用希臘語(如 α 粒子、 γ 射線)、法語(如 PH 值為法語 *pouvoir hydrogène* 的縮寫)等。可是，總的來看，以英語的外文字母詞佔絕大多數。

鄧守信指出：「外來語本就是跨文化的產物。在兩個文化差距甚大時，外來語需要經過各種不同的管道讓吸收者適應、接受、使用。但在差距拉近後，管道的性質便可以單純化，「借」的方式也能較「直接」。」⁹²這就說明中國同英語圈國家的文化交流促進外文字母詞直接進入漢語系統內。外文字母詞能在漢語中大量出現並立足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國人文化素質在不斷提高，並對英語的教學非常重視，對於外文字母詞感覺易讀易記，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越來越強。再加上漢語圈音譯外來詞用字不統一的問題客觀上也促進了字母外來詞的出現和使用。比如，BP 機只有一種形式，也是單義的，而它的漢字表達法，現在至少有三種，即“尋呼機”、“傳呼機”和“呼叫機”等。由上述的種種原因，外文字母詞呈現的趨勢，在漢語裡獨樹一幟。

外文字母詞在漢語中與日俱增，其性質問題引起學者們的關注，劉

⁹⁰ 參見胡曉清著，《外來詞》(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 年 6 月)，頁 35-38。

⁹¹ David Crystal 在《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主張因英語佔地理、歷史以及社會、文化的優勢，可成為世界通用語。

⁹² 鄧守信著，〈台灣地區外來語的動態結構〉，《第四屆世界華語文研討會論文集—語文分析組》，世界華文協進會，1994 年，頁 58。

涌泉認為：「字母詞是指漢語中帶外文字母或完全用外文字母表達的詞，前者如“B 超”、“卡拉 OK”；後者如 CD、UFO。它是一種新形的外來語。」

⁹³以下按照劉涌泉的標準分成英漢夾雜和全外文形式兩個方面探討外文字母詞的性質。

英漢夾雜——在目前外來詞湧現的情況下，當一些外來的詞語一時難以譯定時，出於方便快捷的原則，就出現了一些英漢夾雜的詞語。如“BP 機”，BP 是英文 beeper 的縮寫，beeper 意譯為“發出尖銳而短暫音響的機器”。“IBM 公司”，IBM 是英文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的縮寫，“公司”是 corporation 的意譯，該名稱意為“國際商用機器公司”。⁹⁴也有些是由其它方式構成，如“卡拉 OK”是一個英語和日語的“混血兒”，“卡拉”由日語音譯，意思是“空”，“OK”是英語 orchestra 的簡寫，合起來指的是“無人伴奏的樂隊”，而 KTV 又是由“卡拉 OK”和 television 構成，指“演藝或餐飲場所的卡拉 OK 包間”。起初人們對這種不中不洋、土洋結合的外來詞難以接受，用起來覺得別扭，使用範圍狹窄。然而，由於新聞傳播媒體的普及，人們對這種外來詞的使用已不再覺得別扭，久而久之也漸漸能夠運用自如了。而且，英漢夾雜形式跟全外文形式比起來，前者有在日常生活更常用的趨勢。

全外文形式——漢語借用全外文形式的外來詞可以避免意譯冗長的不足，又有利於中國在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對外交流與合

⁹³ 劉涌泉著，〈談談字母詞〉，《語文建設》，1994 年第 10 期，頁 7。

⁹⁴ 呂冀平著，《當前我國語言文字的規範化問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263。

作。全外文形式的外來詞涉及的面很廣，除了科技等專業方面以外，目前，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使用著。全外文形式的外來詞各字母之間，不存在漢語詞法結構中的各種關係，它表現為字母的線性排列。實際上，這些字母多為英語單詞的縮寫。例如，“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WWW”（World Wide Web）、“CT”（computed Tomography）等。

音讀方式上，外文字母詞大概有三種音讀表現。一種，以音素的相應書寫字母來讀，一律發成該字母的讀音，例如 B.C.(Before Christ)(公元前)、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英國廣播公司）等；第二種，以該字母所代表的語言單位來讀，比如 e. g.要讀做所代表的 for example(例如)、etc.代表 et cetera(等等)，讀做 and so forth 等；第三種是拼讀，將這些組合在一起的音素重新拼讀成一個類似於詞的語言單位，比如 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北大西洋公約組織)、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al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可是，漢語縮略詞語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它一般以提取的單位的音讀來發音，比如，從“科學研究”而來的“科研”，音讀形式同於“科”和“研”在原式中的音讀形式，一般不會有甚麼改變。

目前還有一種引人注目的趨勢，是直接以英語單詞出現，這種詞並不與漢字構成混合詞，而是作為獨立的詞直接進入漢語。英語單詞多出現在專業性比較強的領域中，計算機領域這一類詞很多，如，“internet”、“Windows”、“Word”、“Office”、“Excel”等等。

再如，“bye-bye”，學生幾乎都說“bye-bye”代替“再見”，還有“OK”、“pass”等等。這些英語單詞在漢語中也有相應的同意詞，可是，人們卻

喜歡使用英語單詞。而且這些詞的使用頻率也相當高，像“bye-bye”、“OK”等已開始“漢化”，成為漢語詞彙的一部分。

其實，理想的詞彙系統應當是一個詞指稱一種事物，具有一種涵義，只用一個語言符號來表示。但是，世界上並沒有一種語言是這個樣子的。造成這種語言詞彙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這些語言符號所蘊含的語意色彩有所差異，這種差異導致人們在使用語言時會有所選擇。觀察現代外來詞的形成，固然它們大多數是因為文化的接觸，導致社會變遷的情況下應運而生的。然而，它們卻常常演變為多種形式，亦即一義多名的現象。但仔細觀之，此一義，其實也包含了多樣、豐富的感情色彩。

全外文形式一般書寫為拉丁字母，直接發字母音，而不再需要相拼或是用本族語進音譯。這些詞的優點是詞形固定。但是，在外文字母詞急增的情況下，對大多數漢語使用者來說，並不了解這些外文字母詞的來龍去脈，因此，通過這些字母不可能聯想到相應的英文單詞，在字母與其所表示的整體意義之間失去了所有的理據性。這時，外文字母詞就成了一種類似於純音譯詞的抽象符號，其能指與所指之間完全依靠消耗大量的心理能量以記憶相維系。譬如，WWW 對不精通英語的中國人來說就僅僅意味著三個相同字母而已。其“全球最大的信息網絡”的意義就需要強制記憶。如果這種抽象性符號在漢語中大量出現，人們的記憶就會不堪重負，從而影響記憶和理解的效率。⁹⁵所以，外文字母詞難以理解的特點要求詞典釋義應當更為確切明白，儘可能提供語源背景知識，為人們掌握、運用外文字母詞提供幫助。並且，借用外文字母詞主要為的是書寫的便利，而在語音上並無多少方便可言。漢語中外來詞的直接借用，雖然有一定的書寫便利，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會念不會寫，也不好懂。

⁹⁵ 陳昌來著，《語文論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頁117。

從以上資料的情況看，外文字母詞的特點有以下幾個。第一，從結構形式上看，外文字母詞中絕大多數是名詞。以漢字開頭的外文字母詞較少，而以外文字母開頭的和全部使用外文字母的佔大多數。全部使用外文字母的形式的絕大多數屬於頭字詞(acronym)，即使非頭字詞其音節也都簡短易寫易讀，使用上可能比意譯詞還容易上口，也更能表現流行，同時，可能在擁有多個譯名的情況下，使用外文字母詞反而更清楚明晰。第二，從來源看，絕大多數來源於印歐語系的諸語言，尤其是英語。這是英語在全世界社會許多方面（廣告、電影、通信、言論等）佔最優勢地位的情況下，很自然的結果，同時，整個世界目前變成一個生活圈，一個共用語的需求促進了這些現象。第三，從反映內容上看，字母詞涉及了經濟、教育、科技、日常生活等多個方面，但是，以科技、教育、經濟方面的為最多。

漢語是漢藏語系的主要分支，是孤立語的典型代表，其書面語言為方塊漢字，而英語是印歐語系的分支，具有屈折語的突出特點，採用拼音文字為書面形式。兩者在結構上具有明顯的差異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外文字母詞在漢語中的大量出現是兩種語言、兩種語系的第一次親密接觸，這一點是外文字母詞的意義所在。而且，現代漢語外來詞中，有一些“B 超”、“BP 機”、“CT”、“VCD”、“NBA”這樣的外文字母詞，反映出除了與人們外語水平普遍提高有關外，還與中國社會的發展、人們捨繁就簡的心理以及語言內部的要求有關。外文字母詞是漢語外來詞的新發展，它不但極大的豐富了漢語詞彙，也是現代漢語新詞彙發展的重要特點之一。它們中的許多已經融入了人們的生活，而且，隨著各國交流的進一步深入，新事物的不斷產生，基於外文字母詞的優點，其數量還將進一步擴大。

由以上漢語外來詞的五種分類可看出，漢語吸收外來詞之方式十分多樣化。其中有些詞非常明顯地並且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的變動，例如，

現代漢語中的“洋灰”是中國社會從長時期的封建桎梏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化過程中出現的詞彙。灰是古老中國一直存在的，至少有幾千年的歷史。在這個漢字上加上一個“洋”字，表示這是從外國進口的——在半殖民地社會中，民族的工農業都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只好依賴外國，依賴西方資本·帝國主義。水泥（水泥在舊中國叫做“洋灰”）最初運到中國，是從通商口岸進來的；這種建築材料從廣州引進時，人們不知道叫他甚麼好，不是麵粉，不是米粉，也不是石灰，然而，有點像灰，無以名之便採取接受外來詞最簡單的方法——譯音，按粵方言讀“ce-men-t”，即得到近似的三個漢字：“土—敏—土”；後來——也許是差不多同時——水泥又從上海，寧波這些港口引進了，基於同樣的理由，人們用吳方言寫出了另外三個漢字：“水—門—汀”。“土敏土”和“水門汀”都曾流行過一陣。他們同許多外來詞的命運一樣，或者主要由於這幾個漢字連在一起給不出一個語義，所以不久這種音譯外來詞就讓位於意譯外來詞，“土敏土”和“水門汀”即變為“洋灰”，這種造詞法也是漢語中一種簡易的方法，凡是外來的都加上“洋”，“番”之類字眼就行了。人們不喜歡“洋灰”這種紀錄歷史上的污辱語詞，選擇了“水泥”這樣的名詞作為這種建築材料的名稱。“水泥”曾與“洋灰”並用過一個時期，只是到了四十年代以後，人們才有意識地永遠拋棄了這帶“洋”字的“洋灰”一詞，而選擇了“水泥”這樣的語詞。⁹⁶

但是，不管社會怎樣變動，的確有一個總原則，那就是要對自己方便。一個外來詞要是意譯更方便，自然就用意譯，不能意譯，就用音譯，單純音譯不易理解，就要配上說明。就是完全音譯之外來詞，也要顧及一般人使用之方便，而不斷改進。

⁹⁶ 陳原著，《陳原語言學論著》（卷一）（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頁386-387。

